

苏俄、共产国际

SOVIET RUSSIA ·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CHINESE REVOLUTION

与中国革命

(1919 ~ 1923)

何云庵等／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苏俄、共产国际

SOVIET RUSSIA,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CHINESE REVOLUTION

● 与 中国革命

(1919~1923)

何云庵等／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1919 ~ 1923) / 何云庵等
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7-5097-1050-0

I. 苏... II. 何... III. ①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苏关系
②共产国际-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 IV. K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8552 号

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1919 ~ 1923)

著 者 / 何云庵 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朱希淦

责任校对 / 杨怀怀

责任印制 / 岳 阳 郭 妍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亿方合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6.6

字 数 / 303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050 - 0

定 价 / 4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四川省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 2006 年课题项目 (SC06Z003)

西南交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基金提供出版资助

序

去年，何云庵来京出差，抽空来家看我。谈话中，他提及正在写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书。他说了一些想法，我很赞同。现在，书稿已完成，即将出版。他想让我在书的前面说几句话，我很愿意。

我与云庵相识多年，他虽不是我的学生，但他与我的学生们交往甚密，所以经常与我联系，也应该算是我的学生。云庵教中国革命史课多年，后来虽主要从事西南交大的学校行政工作，但专业研究并未完全放弃。他不仅经常参加学术会议，而且从事研究一些有关中共历史，中国革命史方面的问题。当然，繁杂的行政工作，不可能有更多精力去干自己的事，可他爱思考，有空就闲不住，总要忙里偷闲琢磨一些问题。琢磨来琢磨去，真让他弄出个道道来，叫做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但写出了专著，而且其中不乏独到的见解。

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近代革命的关系，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已经开始，但主要是分析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所起的指导作用。比如由张闻天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当然，也已经出现了对共产国际的乱指挥不满的说法。陈独秀的观点自不待说，是直接攻击的，完全否定的。即使在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时，中共中央在所作决定中，也在肯定共产国际的作用前提下提出一些看法，如：“即使本来没有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亦必将应运而生”；“革命不能输出，亦不能输入，而只能由每个民族内部的发展所引起”；“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斗力量更加提高”。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方面的研究，既说好的作用，又说不好的作用。到20世

2 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19—1923）

纪70年代末，比较深入的研究才真正开始，并在80年代形成了一次高潮，向青、杨云若等人在这方面做过许多有价值的工作，在全国党史学界有很大影响。随后，这方面研究由于受材料的限制转为沉寂。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苏联档案大量公开，特别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在德国自由大学的帮助下，系统整理出版了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这批资料已译成中文出版，对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有很大帮助。不少学者利用这批资料，写出了文章或专著。我知道，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的我的学生李颖，就得益于这批资料，发表了多篇文章，并出版了专著。看来，利用这批资料再加上国内原有的和继续挖掘的资料，已经有条件编写一套多卷本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通史。云庵告诉我，他有这个打算，并说了他的设想，我觉得有一定新意。现在拿来的书稿，就是这部通史的第一卷，希望他继续努力，早日把后边几卷写出来。

说到第一卷的内容，我大致看了一遍，觉得确有特色。概括起来，就是视角新、视野宽。

先说研究视角。作者强调，现有的研究都是从中国革命的角度看共产国际，忽略了从共产国际的角度看中国革命的一面。研究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从哪边看，有什么区别吗？其实是有的。从中国革命的角度看共产国际，由于研究者对中国和中国革命的情况更熟悉，自然对中国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把握得更充分，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更关心，这样就更容易看出共产国际政策和决议的缺点。但从研究的角度，有时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看起来很容易避免的错误，苏联和共产国际那些有丰富经验的革命领袖就一犯再犯呢？用不了解情况来解释，确有一定道理。比如，当时通信尚不发达，有时中国局势发生了变化，消息传出去，国外知道时已经过时。但是，单纯这样解释，也难说明全部问题之所在。如果再进一步解释，就要牵涉到主观动机，认为是拿中国革命当牺牲品，就离真相更远了。如果转一下眼光，站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角度看，就很清楚明白了。十月革命之后，苏俄自然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它要考虑全世界的革命布局，至少包括欧洲革命和亚洲革命这两大块，这就涉及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和某一个国

家的共产党比较，它得到的信息是不一样的，它的考虑所涉及的因素当然也就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有一个整体和局部的关系，有一个主和次、先与后的关系。当然，中国共产党也关心世界革命的整体进展，共产国际也不是对哪个党有天然的亲疏，但毕竟两者的思路是不完全吻合的。这样说并不是为共产国际辩护，它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时还是要这样说。但历史研究首要的是还原历史真相，并对此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研究视角的变化，就可能跳出原来的思维框架，关注原来被忽视的一面，看问题就更全面、更完整，才有可能合乎逻辑地解释历史事实。研究视角变化对研究结论的影响，读者看完书自然会清楚。这里举个例子。比如，书中关于苏联过于注重自身国家利益问题的分析，是实事求是的。近年来的研究几乎都倾向于认为，苏联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过于注重自身的国家利益，包括两次对华宣言。但如果看看1919~1920年列宁和其他革命领袖对世界革命形势的言论就会发现，他们是很真诚地认为世界革命的胜利近在眼前了，也确实想帮助各国的革命运动，这是他们所有决策的基本出发点。在这个大形势下，有的地方胜利早点，有的晚点，有的党、有的国家要暂时作点牺牲，这都是正常的。列宁就说过，苏俄人民在这个过程中是牺牲最大的，因为在援助世界革命的同时他们还要进行国家建设（当然苏联的历史学家过多强调苏联的牺牲也是片面的）。只是形势发展证明这个估计过高，也才有了后来的各国党之间的矛盾，苏联的国家利益也体现出来并越来越强化。

研究历史一定要历史地看问题，也就是把历史上发生的问题放在过去的历史条件下去看，不能用后来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情况去证明前面的事。因为一切历史事物和现象，包括人物、事件、制度、思想等，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所以必须还原到那个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进行具体分析。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特别强调这一点，把它称作“古今中外法”，就是要“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中也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毛泽东和列宁的话说得很到位，对研究历史问

题非常有用。上面说到列宁等对世界革命形势的认识就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根据后来形势的发展分析来说他们估计过高是可以的，但不能说是假的，是出于什么别的目的。

再说视野。以前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比较突出中国共产党这条线；讲国共合作，也主要从共产党这方面讲；提到国民党，也主要讲孙中山。总之以共产党的建立、发展为主线，涉及谁就讲谁。现在看来，还是忽视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其他方面，把复杂丰富的历史简单化了。这本书的视野就从共产党这里迈出去了，更宽了。由于对中国和中国革命的状况不了解，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介入中国革命在方式上是“大撒网”，多头并进。在推进中国革命的总目标下，不同时期针对不同对象，具体目标也有所区别，同时又互相交叉，必须深入细致地阅读史料才能理清楚。此外，以前主要关注联共（布）、共产国际作为党的活动，而对苏俄政府的活动较少关注，也是个不足。在本书里，除了共产党这条线，还详细描述了共产国际和吴佩孚、陈炯明的接触，还专门列了一章讲苏俄政府在华的革命活动，并对几条线的联系也进行了梳理，丰富了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

研究历史，视野要宽，不要只抱住主线，别的全不顾。因为历史过程是复杂的、多变的，一个历史现象的发生，要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在1990年提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历史研究的建议，就是想解决宽视野的问题。我当时提出这个命题是根据马克思的《马志尼和拿破仑》中所说：“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这之后，许多学者的研究视野确实展宽了。云庵似乎受我的影响，在本书中做了一些努力。不过，我觉得还不够，比如国内经济基础发展的叙述几乎没有，而这是产生中国共产党的客观前提。

视角新、视野宽是本书的主要特色，此外在一些细节上也有不少值得关注之处。当然，还是那句老话，书写得到底如何，读者说了算。

张静如

2009年3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1
绪论	1
一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意义和研究 现状	1
二 本书的研究视角和基本观点	4
三 本书的框架	12
第一章 共产国际东方战略及演变	14
一 世界革命理论：从马克思到列宁	15
二 世界革命理论下共产国际对东方革命的总体 构想	30
三 东方战略在中国的实施	46
第二章 加拉罕使华	62
一 加拉罕代表苏俄政府发表两次对华宣言	63
二 加拉罕使华	86
三 对加拉罕使华的评价	110
第三章 帮助创建中国共产党	121
一 五四时期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 分子的出现	121
二 共产国际对中共建党的帮助	131

2 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19—1923）

第四章 苏俄、共产国际在中国寻求盟友的抉择	216
一 寻找盟友策略的提出	217
二 盟友选择的标准	219
三 苏俄、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初期接触	222
四 苏俄、共产国际与吴佩孚的接触及联吴 设想的失败	230
五 苏俄、共产国际与陈炯明的接触	249
六 与国民党结盟策略的确定	258
第五章 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提出与实现	268
一 中共“二大”联合战线思想的提出	268
二 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党内合作策略的确立	276
三 西湖会议与中共对党内合作方式的逐步接受	291
四 国民党内对国共合作的不同看法	300
五 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影响	306
后记	320

绪 论

一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 研究意义和研究现状

从 1919 年到 1943 年，共产国际存在了 24 年。在共产国际成立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欧洲和亚洲都席卷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共产国际赋予自己的使命就是把这些浪潮变成红色的海洋。在它解散的时候，另一场规模更大的世界战争激战正酣，苏联和中国作为主要参与者的盟国集团全力对抗人类共同的敌人——法西斯势力。一头一尾形成了两个悖论：当共产国际和苏俄满怀理想主义的热情去推进世界革命时，这些努力和牺牲并没有变成“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现实；当共产国际渐渐褪去理想主义色彩并最终解散，却处在取得更大胜利的前夜：从 1945 年到 1949 年，在欧洲和亚洲相继建立了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形成了和资本主义阵营分庭抗礼的社会主义阵营，并在 20 世纪 60 年代使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瓦解。

无论如何，作为十月革命直接产物的共产国际及其活动对 20 世纪世界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就中国而言，自 1919 年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共产国际的身影。如果对上述悖论作一个简洁的解释，那么可以说，尽管在表面上存在目标和结果的反差，但实际上，20 世纪 40 年代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推进其实正是此前共产国际努力的果实。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这些果实的标志，那么作为种子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和推动之下建立并获得最初发展的。朝鲜、蒙古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组织也可以作同样的追溯。但另一方面，也是

2 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19—1923）

由于共产国际对各民族革命特殊性的估计过低，导致了各国革命进行中都有过重大的挫折和失败。共产国际的解散，就其内部原因说^①是对这个失误的间接承认。

因此，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所有共产国际支部对这个“世界共产党”的心态是复杂的：它们都曾受益于共产国际，却也受制于共产国际。后一方面曾给各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挫折。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有的是革命中正常的对形势估计的偏差，但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共产国际和苏俄、俄共（布）^② 纠缠不清的关系。按照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俄共（布）是它的一个支部，但实际的情形却相反，共产国际要听命于俄共（布）政治局及其最高领导人。于是，世界革命的利益和苏俄国家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导致了一系列互相矛盾的判断和政策。这在中国革命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事实上，即使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联共（布）对各国党仍在施加相当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20 世纪 60 年代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也在相当程度上肇因于此。

基于这个原因，和它的重要性极不相称，共产国际和苏俄、联共（布）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长期以来没有展开充分的研究，许多重要的细节笼罩在一团迷雾当中。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在革命实践中探索出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但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失误仍是绝口不提。直到苏共二十大之后，才在党内小范围地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名。1956 年 9 月，毛泽东才说出多年郁积在心的话：“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它把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区几乎搞垮了百分之百。”并从总体上对共产国际和苏俄、联共（布）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做了“两头好，中间差”的判断。^③ 1960 年，周恩来

① 共产国际解散的直接原因是英美等二战时盟国的反对。

② 1917 年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的全称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1922 年始称苏联。本研究跨越 1922 年，故称苏俄。其共产党组织名称同样几经变化，有俄共（布）、联共（布）、苏共几个时期，本研究在涉及不同时段时，即用当时对应的名称。

③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 120 页。

对中共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作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专题报告，系统回顾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完善了“两头好，中间差”的判断，指出：“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①但这些反思和判断，仅仅限于党内高层，学术界仍然无法展开相应的研究。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大陆学界的研究才得以展开。这一时期，“据不完全统计，仅在 80 年代，大陆各种报刊上发表的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有关的论文、译文和其他各类文章就有八九百种之多，各出版机构出版的论著、回忆录和档案资料集之类的专书也有七八十种之多。不过十年时间，在北京及各地召开的不同规模的有关这一问题的学术研讨会亦超过十次以上。北京、四川、安徽、上海等地都出现了相应的研究团体，齐心协力翻译出版前苏联的各种文献资料和回忆录。……一些涉及这一课题的最基本的研究史料，几乎都是在 80 年代中前期翻译出版的。”从研究成果看，“在涉及中共早期建党、共产国际对第一次国共合作乃至大革命的指导作用、王明对中共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贡献、共产国际帮助毛泽东成为中共领袖等问题上，均已取得了重要的突破与进展。”^②

进入 90 年代之后，随着苏联解体，苏联档案大量公开。俄罗斯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帮助下开始系统整理和出版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的档案文献资料，公布了 1000 多份档案材料，对国内涉及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帮助极大。迄今为止，这一档案整理出版工作已基本上完成了 1919～1937 年的部分，并全部翻译成中文出版。由于时间渐远和档案资料的不断开放，能够得以历史地和全面地进行观察和分析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走向了深入和成熟。主要表现在，受意识形态的干扰（不仅是客观环境，也包括研究者的主观方面）越来越少，可以像对其他历史事件一样，对共产国际及其与中国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 301 页。

② 杨奎松：《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史研究的进展问题》，《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3 期。

革命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在结论上也更趋近历史真相。

在这个基础上，已经可以对共产国际和苏俄、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整个历史进程进行总体的回顾和评述了，本研究就是这样的尝试。

二 本书的研究视角和基本观点

相对于既有研究，本研究的基本视角和观点是注意从共产国际的角度看中国革命。既有研究通常从中国革命出发，把共产国际当成是中国革命的外部因素之一。^①从宏观上和较长的时段上，这个看法是成立的。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及成立的初期并非如此。所以，虽然既有研究在结论上认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主要应由共产国际承担责任（这和他的看法相同），但对共产国际何以犯了错误缺乏深入的探讨。我们不能仅仅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指示作为观察的中心，而把共产国际在对中国革命发言的同时还在想些和做些什么当成一般性的背景。很多问题，如果站在共产国际的角度看，就顺理成章了（当然不意味我们肯定它的看法，但那是价值判断问题）。

在反思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失误上，有几个基本的观点。其一，认为共产国际把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其他派别，包括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划入敌对的阵营，和资产阶级同等对待，是很大的错误。有研究者进一步指出，这是中共成立初期对其他党派采取排斥政策的根源。其二，共产国际在组织原则上过于强调集中，忽略了各国革命的特殊性。^②周恩来在1960年总结说：“共产国际

① 这也是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中较为普遍存在的问题，杨奎松在关于国共关系的新著中即指出了这一缺陷。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② 关于第一点和第二点，参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增补版，第646页。关于共产国际排斥其他党派的政策对中共的影响，参见张喜德《中共早期排斥国民党的政策与共产国际成立伊始的“进攻理论”》，载《“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中期的缺点和错误，概括地说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①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说得更为生动和直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上，“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任何外国党的同志要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是肯定要犯错误的”。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讲话，更加重了这个观点的分量。其三，不少学者现在更多地通过对历史细节的重构，强调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在对待中国和中国革命问题上对苏联国家利益的关注，认为共产国际把苏联的国家民族利益置于世界革命利益之上，或以世界革命利益为名，行维护苏联国家民族利益之实，损害甚至牺牲了各国党和革命。这就不仅仅是失误或错误问题，已经是动机问题了。

从后果而言，上述反思是完全正确的。从政治和政策角度，这样的反思也是可以的。但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则不能拿后人的“后见之明”来要求前人，而要尽量返回历史现场，对前人“表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我们从对这几个观点的分析入手，开始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进行回顾。

共产国际的成立及对非共产党派别的态度问题 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3月，但它的酝酿可以追溯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前，甚至更早。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第二国际内各社会主义政党的分化更加严重，尤其是各交战国的党都面临着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支持本国政府还是反对本国政府。结果，7个交战国的10个社会主义政党中，大多数选择了支持本国政府。这不仅导致了第二国际的分裂，也导致了各社会主义政党内部的分裂。

随着战争的僵持和长期化，各交战国的反战运动开始兴起并日益高涨，各社会主义政党内的左派力量也开始汇集并不断扩大影响。1915年9月，来自德国、俄国等12个国家坚持第二国际旧有原则、反对战争的38名政党、工团和派别的代表，召开齐美尔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301页。

瓦尔德会议。在会议上，形成了以俄国布尔什维克派领导人列宁为核心的左派集团，并开始谋求同第二国际决裂建立一个新的国际。

世界大战在继续，各国的反战运动更加深入，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1917年2月，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沙皇统治被推翻。列宁根据对形势的判断，指出：“应当毫不迟延地建立起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新国际。”^①他回顾1915年齐美尔瓦尔德会议说：“现在已经十分清楚，代表会议犯了错误……我们留在齐美尔瓦尔德，也是在推迟第三国际的建立（虽然这违反我们的意愿）；我们不摆脱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已经死亡的齐美尔瓦尔德这个沉重的包袱，就是间接地阻碍第三国际的建立。”^②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新的国际的创建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筹建第三国际的步伐加快了。1919年3月2日，共产国际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两天后改为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正式成立。

尽管有了几年的酝酿，但共产国际的成立仍是匆忙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有较大的分歧。分歧首先发生在列宁和第二国际的领袖考茨基之间。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反对十月革命，他们认为十月革命是时机不成熟的革命，也反对布尔什维克党所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等原则。他们主张重建第二国际，并在1919年初采取一系列行动加快了复活第二国际的步伐。而列宁则认为，此时恢复第二国际是阻碍和破坏革命。在各国共产党之间也存在着分歧。罗莎·卢森堡主张新的国际应是一个以革命的群众性政党为基础的国际，而不是一个像布尔什维克党那样由少数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封闭型的组织。因此，应等到西欧的群众性政党愿意参加时，再成立第三国际。在1919年3月1日列宁主持的预备会议上，德国党的代表表达了反对意见，认为目前只能召开第三国际筹备大会而不是成立大会。由于德国党的代表的坚持，原定3月2日召开的成立大会临时改成了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由于俄国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175页。

②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183～184页。

和芬兰等国共产党的再次呼吁，才再次改回成立大会。^①

之所以如此匆忙地成立共产国际这个新的国际共产党组织，是因为世界革命形势，尤其是欧洲革命形势的发展。从1918年起，欧洲革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用共产国际“一大”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中的语言来表述，就是：“新的时代已经开始！这是资本主义土崩瓦解的时代，这是资本主义内部分崩离析的时代，这是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② 共产国际“一大”刚刚结束，从1919年3月到6月，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相继诞生，法国、意大利、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也兴起了“不许干涉苏俄”的工人运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不久，列宁就说：“匈牙利的革命终于证明，苏维埃运动正在西欧发展起来，它的胜利为期不远了。”^③ 他在1919年4月15日的莫斯科苏维埃指挥员第一期训练班上的讲话时甚至预言：“你们亲眼看到了匈牙利共和国、苏维埃巴伐利亚和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成立，你们很快就会看到世界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成立。”^④ 因为，在列宁看来：“我们正处在一个最紧要、最重要、最有意义的历史关头——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成熟的关头”^⑤。“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接近世界革命，世界千百万无产者一定会跟随我们前进”^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一文中这样写道：“当我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第三国际已经拥有3个苏维埃共和国……俄国、匈牙利、巴伐利亚……作为自己的主要基地。而当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如果我们已经拥有不是3个，而是6个或者更多的苏维埃共和国，那是谁也不会感到惊讶的……旧欧洲正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奔向无产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57页。

② 参见高放等《三个国际的历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第283—288页。

③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252页。

④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287页。

⑤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75页。

⑥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117页。